

委员 时间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乃中华民族根和魂的物化形态

王震中

相关链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致力于黄河文化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研究，发表了相关论文论著。王震中委员结合所参与的两次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调研经历，以及在全国政协“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上的收获，讲述其对于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在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方面，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历史文化遗产云集的大手笔。2021年，我有幸参加了两次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调研：一次是2021年9月8日至9月12日，赴山西省忻州市、临汾市、运城等地，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保护利用”调研；另一次是2021年10月14日至17日，赴宁夏银川市、吴忠市、中卫市、中卫市等地，进行了“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宁夏调研。两次调研，收获颇丰，认识也有升华。在调研的基础上，2022年11月11日，汪洋主席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围绕“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协商议政，我在远程协商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视音频发言。将调研以及远程协商会所获得的认识予以系统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与黄河沿线九省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有多方面的交叉，把二者统筹兼顾，无论对于资金费用合理有效使用而言，还是对于九省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言，都是最科学合理、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作为文化遗产，它有的属于包括石窟、寺庙、古建筑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有的属于包括大遗址等各类考古遗址和文物。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大遗址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用它们来充实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时，需因地制宜，在凸显当地历史文化特点的同时，选取那些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这样做，可以使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格局既是国家级的，又具有其独特性。

第二，把石窟、寺庙、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大遗址作为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的文化资源，可以使不可移动文物和大遗址的状况得到三个方面的改善：一方面，以前有些不可移动文物因担心修缮可能造成失真而不做定期修缮，致使一些著名古建筑特别是建筑内的壁画等破旧不堪，而作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之后，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对著名古建筑、文物等做定期修缮，是能够把维持原貌与美丽壮观和有观赏性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改变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之后“一锁了之”的做法，让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真正“活起来”。第三个方面，考古发掘的大遗址每每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长期发掘，把已有的大遗址或考古遗址公园等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之后，就可以把遗址的文化功能充分利用起来，让考古走进大众，把展示与长期的考古发掘统一起来。

第三，沿黄九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华民族根和魂的物化形态。我们用物化的、形象的文化遗产来充实公园的内涵，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又使得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将成为传世之佳作，并能使人们在游览观赏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熏陶。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是与黄河文化的历史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的中心和重心。在这里，我们从“文明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可以看到它们无不与黄河文化关联在一起。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灿烂的文化就展现了多姿多彩。她从距今一万年前的农业的发明开始所经历的“聚落三形态的演进路径”——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典型路径。她从五帝时代的“万邦”文明走向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文明。如果说五帝时代的万邦是多元的，那么夏商周三代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则是一体的，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三代王朝实现了从“多源”走向了“一体”。夏商周三代这种“多源一体”（或可称“一元多支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是秦汉以来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前身。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原正统观。中原正统观始自夏王朝，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而夏商西周王朝的国都在黄河中游地区，再加上从秦汉到北宋中国“帝制王朝”的国都也都在黄河中游地区，所以中华正统观念与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重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是密不可分的。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起端，到夏商西周奠定了基础。我们从山西襄

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黄河中游中原腹地与四方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中原王朝把从周边吸收汇聚的文化因素加以提炼升华，成为华夏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叫文化内聚；另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向外的文化辐射。中原王朝国家向外的文化辐射传播有一个规律：即辐射传播到各地的都是礼器，有青铜礼器、陶礼器，也有玉礼器。在古人看来“器以藏礼”，由此我们说，中原王朝国家在向外传播礼器的同时，也把中原华夏礼制传到了四方。也就是说，中原王朝输出的是礼制教化，礼乐文明这样的政治文化，这既体现在内部，也表现于对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只是夏商周三代的礼各有特点，比如商代的礼注重处理的是人神之间的关系，而西周的礼更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我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其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其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形成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因此，《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说：“天听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天命”“民情”“德政”联系在一起，从天命出发而转入了德治。由于西周的礼乐是理性主导的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所以得到孔子推崇。孔子向往西周，向往周公，其根源即在于此。为此，我们把作为理性人文的礼乐文明根植于西周，说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

来进入了“自觉”阶段。我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看，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中华民族是由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的国家结构造就的；她以统一的国家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的国家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这样的历史画卷，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的历史文化遗址，大大浓缩了起来，形象化了起来。为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里的文化遗产乃弥足珍贵的中华民族根和魂的物化形态；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充分地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址，是一举多得的举措，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建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黄河流域(宁夏段)一隅

书苑 随笔

第十一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会知名，酒更知名。“世界白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贵州”。贵州作为中国酱酒大本营，白酒无疑是贵州省一张靓丽名片，白酒产业成为贵州产业结构里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茅台酒，走遍全世界，都在夸茅台。

酒知名，文化更璀璨。名曰“酒博会”，会之堪“博”，在酒好客多，也在文化厚重。贵州的好酒，连着文化，浸润文化。比如，全世界都闻名茅台酒，也都知道红军经此长征的历史传奇。茅台酒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机缘，进一步提升了茅台酒谷酱香型酒的文化内涵品质，革命与美酒，英雄与美酒，伟人与美酒，在贵州频频汇集。现在，贵州县县通高速，立交大桥如彩虹，美景与美酒，美人与美酒，美好与美酒，又在这里相遇相融。贵州，历史传奇，名震八方。贵州，地灵人杰，世代飘香。贵州，醉美多彩，心旷神怡。贵州，快速发展，后来居上。

贵州是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和主产区。贵州省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酿酒历史、精湛的酿酒技艺、多彩的酒文化习俗，构成了贵州厚重的酒文化底蕴，是贵州酱酒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之魂、文化之根，是贵州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在中国的一部文明史上，酒之为酒，不仅是酒，更是文化；酒中更香、更醇的，是其中蕴含、沉淀、积聚、展现着的底蕴丰厚的“酒文化”。饮酒品酒，最有味道的其实是酒文化。酒不醉人人自醉，皆因酒中有文化。

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乃其个人之选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将其中的咏酒言情句，列出十一类，展示于网上的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中，令人且吟且醉。我且略略抄来几句。

之一：离情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酒后留君待明月，还将明月送君回。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之二：友情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无辞一杯酒，昔日与君深。

之三：纵情
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酒酣耳热忘头白。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之四：诗情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汝阳三斗始朝天，逢逢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之五：“忘忧却更忧”
眼前一杯酒，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
举杯消愁愁更愁。

之六：乡愁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之七：独乐
浊醪谁造汝，一酌敢千愁。
谁嫌陌树频惊鸟，半醉归途数问人。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花间酒气春风暖，竹里棋声暮雨寒。

之八：众乐
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醒。
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之九：伤情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醉里更寻骑马路，萧条几处有垂杨。

之十：劝酒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之十一：闲情
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唐诗中的酒文化

叶小文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山水琴瑟尽，风花酌酒频。
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

之七：独乐
浊醪谁造汝，一酌敢千愁。
谁嫌陌树频惊鸟，半醉归途数问人。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花间酒气春风暖，竹里棋声暮雨寒。

之八：众乐
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醒。
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之九：伤情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醉里更寻骑马路，萧条几处有垂杨。

之十：劝酒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之十一：闲情
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以上饮酒言情之句，竟可分列出十一类来。当然，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李白的《将进酒》。参加博览会的八方嘉宾，乘兴而来，微醺而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贵州美酒如泉涌，情义深深多传奇。请来贵州歌与诗，不废江河万古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新知 书架

《宝水》：呈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

《宝水》是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人到中年的地青萍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这部长篇小说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谢颖）

《我·音乐·音乐家》：讲述对音乐的理论见解

《我·音乐·音乐家》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昭继2014年出版杂文集《我与音乐和音乐家》之后，又陆续写了一些杂文和短论，将其汇总分类集结出版的一部力作。文集由散文与记事、乐评与序言、短论与致辞、文论与演讲、附录五个部分组成，涉及作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和任教管理的经历、音乐短篇文论以及音乐访谈等，体现了作者对音乐理论、音乐学科建设、音乐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度见解。（杨雪）

《信仰》：让真理实践指向崇高信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所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与社会主义的“理”》近日出版。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以“信仰”为题，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开放的理论，所具有的真理性力量、道义力量、实践力量和创新力量，让真理实践指向崇高信仰。（张丽）

《梅兰芳画传》：整体梳理梅兰芳艺术人生

近日，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勇主编的《梅兰芳画传》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成立课题组，从艺术与文献馆藏图片中遴选出与梅兰芳有关照片，对入选图片的编排结构及文字说明进行了整体梳理和认真撰写，并请教多位戏曲界及艺术专家，对画传整体构架进行反复校准，最终形成了梅兰芳评传、梅兰芳画传、梅兰芳年谱简编、编后记的编撰结构。（郭海瑾）

评序 专栏



▲《千里走运河》 冯并 著

中国的大运河是一张巨大的人工水网，是当年的物流人流高速路。从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的历史印迹上看，上半部宛若一个正三角形，下部用了一条弧线，如果隋唐运河能够还原，基本是一个大的菱形，覆盖了中原和东部的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物流平台，也是文明延续的血脉。它的历史流通作用，目前似乎有所减弱，但对我们来讲，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记忆，同长城一样，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骄傲。现在，它还养育着中华子孙，在一座座运河城镇里，书写着全新的发展篇章。

行走在运河城市里，谁都会有新的认知和收获。运河既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交通载体，也会继续它的历史使命。在现代航空、交通方式的可选择性很多，便捷的航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成为新的出行方式和物流主要通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运河交通注

行走在运河边

——《千里走运河》创作谈

冯并

定是现代物流的弱势方式，或者只是旅游镜头中的一景。中国运河展现了中华民族水文化和水经济的发展智慧，也是一部折射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演进历史的百科全书。

行走在运河边，也让我油然想起明清初学者张岱所写的《夜航船》，无论是东西向为主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后来主要是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并不简单地就是运河轴线的更替变化。文化知识的传递流布，在很长时间里通过运河之舟来实现，更遑论一代一代的水利人，如何利用自己的知识，不断构建更新了极为庞大的运河体系，使之形成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商业和文化舞台，在中华文明的整合发展中所起到的有形和无形的作用。

中国运河是真正的地上银河，运河城市也是这地上银河中一颗颗永远闪亮的星。描述和记录运河城市的古今形态以及今后的演变，不只是为了叙述过往，也要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运河意识，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多种需求，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优化包括现代运河的发展结构。老运河有新传，新运河有古韵，运河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要在经济内循环及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新的作用。

面对运河，至少要有这样几个思索。比如，中国大运河所展示的中国智慧和水利科技在未来流通中发挥什么样的新作

用。又比如，它与我们提倡的绿色宜居城镇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比如，运河保护和持续运作对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市场效应，它在当前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甚至，中国的大运河能否全面复兴，新的世纪新运河又从哪里开始出现，这些问题都与我们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有着紧密的关联。

京杭大运河一般分为七个历史和现实段落，北运河和南运河是以天津为原点划分的，接下来就是鲁运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包括里运河和早期的茆沟，再接下来就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乃至跨越“江浦古道”抵达泉州，和跨越“梅岭古道”的潜在“南北大水道”。隋唐大运河的通航渠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但永济渠和后来的漳卫运河河身犹在，繁荣了700年的通济渠能不能全面复兴，更是我关注所在。本书大体上以运河城市的发育历史为参照坐标，按照运河演变的年代顺序进行编排，也有不同时段流向穿插其间，但很多文章的采写有一定连续性。一共分为四卷，从运河东部最早的枢纽城市扬州开始，分别叙述了对长江以北运河城镇、长江以南运河城镇、卫运河和隋唐通济渠曾经流经的城市，形成有合的谋篇结构。也插入运河的一些特殊形态，如胶州湾的“海运河”和人们正在谋划的“南北大水道”以及正在开工

建设的西江“平陆运河”等等。从总体上看，有的运河段落目前仍然异常活跃，伴随城市扩容，运河主河道也会发生调整演变，“宜游则游，宜航则航”有了新的布局。不论它们未来如何演变，都会勾起人们对它前生今生的无尽回忆和对运河未来的许多遐想。运河城镇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发展，因运河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运河是华夏水文化、水经济的伟大创造，无论是现在和未来，它永远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

数了数，从运河新老地标城镇的角度看，已有定论的重要运河城市，大大小小约有35座。用35篇简短笔记来记录，自然也会挂一漏万。而且城镇的规模不尽一样，发展状态各有千秋，但从昔日和今日运河流水声中，倾听和感知水的律动，从历史变化中透视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终究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这些城镇我都去过，有的不止一次，有的则有些走马观花，但也留有一定的印象。书写本身就具有侧面性，目力和水平所限，一定会有一些荒疏，加上运河功能和环境布局也在不断变化，聚焦兴趣也有即时性，很可能漏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也只能是写意多于写实，能够反映在运河城镇中所见到的大脉络，也就不负此行了。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